

中国文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精神写照。文学史上的名家之所以赢得后人的尊重,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的作品形象地展现了时代的风貌、社会的变迁,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难和抗争、理想和追求,深刻地揭示了中华文明独有的精神特质和丰富的文化底蕴,含蓄内敛、坚强乐观、渊源有自、历久弥新。

孙犁的小说《嘱咐》描写一个士兵在战争间歇回家,日夜兼程往回赶,到了村口,却不敢再往前走了,坐下来,抽了一袋烟,抚平一下心情。经历了多年的战乱,他不知道家里的境况如何。待心情略微安定一些,他才慢慢走到熟悉的家门口,刚一推门,他的妻子正往外走。俩人猛一对视,都愣住了。过了片刻,妻子才说“你”,便转过身去,眼泪下来了。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一个普通百姓的悲欢离合,竟都浓缩在这“你”字上。有人曾认为这种描写过于小气,无法叫西方人理解。在某些人看来,只有轰轰烈烈的爱情,才叫爱情。孙犁笔下的平凡男女,没有海誓山盟,没有天崩地裂,千言万语就浓缩为一个“你”字。我相信,中国人都懂。这才是传统中国人的情感表达。唐宋之问《渡汉江》:“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近乡情怯,不正是孙犁所写的这种场面吗?

在安史之乱中,杜甫与家人离散,他在《述怀》中说:“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兵荒马乱之际,亲人的消息断了,自从寄出那封信,已经过去10个月,现在

反而怕接到来信,就怕凶多吉少。在与妻子、儿女分别3个年头后,杜甫终于可以去探望妻小,到家里写下著名的《羌村三首》。“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夜深人静,这对饱受磨难的老夫老妻,执手相看泪眼,依然感觉像是梦一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简单的10个字,蕴藏着多么深厚的情感。这不正是我们含蓄内敛民族性格的生动写照吗?

我们的故事传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即使是死的主题,也要处理成爱和生命的胜利。《孔雀东南飞》的结尾以极其感人的笔调渲染了刘兰芝和焦仲卿死后的悲壮氛围:墓地有松柏梧桐,浓荫覆盖,林中又有一对鸳鸯相向而鸣,似乎是两人精魂所化,象征着两人的爱情永久不渝,再没有什么力量能把他们拆散。这样的文学手法,就像梁山伯和祝英台故事中化作双飞蝶一样,将悲剧的题材处理成爱与生命的胜利。有情人不能成眷属,但是在理想的天国里,他们还是不放弃自己刻骨铭心的追求,或为比翼鸟,或为连理枝。窦娥含冤,死后也要化作冤魂昭示天下,六月飞雪,三年大旱,最终得以昭雪。

我们的文学艺术,就是在这些平凡的细节描写中,充分展现中国人的美好心灵,崇高情感和不屈性格,让读者深切地感受到一种力量,并由此得到升华。中华民族虽历尽沧桑、饱受苦难,但从来没有放弃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国家统一的认同、对民族强盛的期盼。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没有豪言壮语,没有高头讲章,在朴素平凡的生活中,苦干实干,勇敢顽强,生动地诠释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

孔子说,诗可以兴观群怨,可以事父事君;文学还可以凝聚人心、连接世界。通过文学这个窗口,很多有识之士发现,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有助于将国家精神意志、民族文化理念内化为个体的自觉,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中国智慧。

探寻军旅叙事新空间

傅逸尘

进入新时代,伴随着文学生态、创作主体、接受评价、审美经验的全方位嬗变,军旅文学新的表现方式与叙事空间在哪里?这是一个重要课题,也积蓄着军旅文学变革前行的力量。在这样的情势下,军旅文学呈现新的文学风景。一些作家试图探寻宏大历史背景下的“个人化”叙事,强调叙事中的“个人化”想象,以期拓展和丰富军旅文学的表现空间、叙事向度、话语方式以及美学风格。这种“个人化”想象凸显的是以往英雄与传奇话语的背面,即更多地还原和展现“历史化”大叙事下个体生命的存在与命运。

检视当下的军旅小说创作,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战争历史题材仍然占据主流。创作主体开始有意识地对战争情境中人性的复杂性与历史的偶然性等因素进行探索性开掘,为以往单向度的革命历史增添了某种新鲜的视角和发现——已经“历史化”了的革命历史遭遇了来自文学的重构或曰重新阐释。

从文学的角度论,宏大叙事当然是历史叙事的主体或主流,主导着社会思想和时代精神,并产生过许多经典巨著。这些名著之所以成为经典,恰恰在于作品没有忽略那些普通人的个体生命存在,以细节的形式保留了大量战争中的日常生活经验,使得宏阔诡谲的历史叙事有了可触摸、可感知的血肉。这些细节是历史的源头,丰富而真实,是积土与跬步,后来的高山与千里都来源于它们。人的复杂性与历史的偶然性在革命历史的整体中是巨大的存在,构成了革命历史的最初底色,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革命历史的进程与走向。叙述或言

说历史真实,作家首先要对“历史化”进行一番祛魅,过程中可能会发现诸多断裂与缝隙。这为那些试图探寻历史本相的严肃作家提供了打捞历史丰富存在、发挥“个人化”想象的叙事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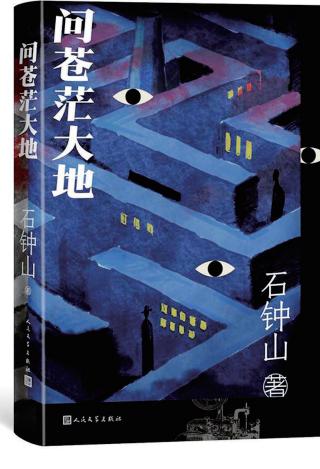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史诗性的宏阔辽远令人着迷,从那种完整的线性历史和时间框架中更是可以得出一种清晰明确的价值判断,可以轻易地厘清庸常凡俗与伟岸壮丽的界限,从而得到对英雄精神的尊崇。而那些渺小的个人经验、那些微不足道的个人记忆,只有被贴上巨大的历史标签或成为特殊的新闻事件之后,才能被关注而获得意义。尽管很多作家强调个人性,但是他们所投入的恰恰是一种经验不断被公共化的写作潮流,是对时代质地和个体生命的简化。在当下的很多战争叙事(当然也包括影视剧)中,我们读到(看到)的是越来越普遍的对世界的简化。事实上,文学应该是反抗简化和遗忘的,它的使命是照亮、守护生活世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处在战争历史进程中的人们,除了那奋不顾身的生死一击,是否还有其他存在的方式和命运的安排?那些因为坚定地朝向生而必须承受的隐忍、担负、背叛,以及短暂的甜蜜幸福和长久的悲伤痛苦又该如何处置?还有那些刻骨铭心却又无法整全的乱世爱情又该如何收场?凡此种种,那些或鲜为人知、或习焉不察的隐秘情感,都被僵化的历史观念和简化的叙事伦理忽略和遮蔽掉了。

战争历史不仅是一条汪洋大河,更是一个复杂的水系、一个辽阔的流域。我们不能只是注意到河流的

最终走向,却对那些或汇入或溢出主河道的细小支流视而不见。在张庆国的《老鹰之歌》中,那些参与并见证战争进程的小人物,在历史的缝隙中左支右绌、拼尽全力、默默承受、遍体鳞伤。张庆国试图打捞起那些关乎个体命运也牵系民族历史的记忆碎片,拼接、编织出一个充斥着含混与哲思、新鲜饱满的生命世界。窦椋的《全面击溃》沉入军旅现实生活的深度经验与内在肌理,打破过往英雄成长的叙事套路,在对个体军人形象的细腻刻画与镜像书写中,折射出新型高素质军人的内在品质与时代新质。

这样的小说,并不属于世界之大,而是勉力写出了世界之小。每个人物、每个生命都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世界,都有自己的价值和意义。这些真实绽放的生命,为了心中的情感、价值、信仰奋斗过、搏杀过,他们的生命值得尊重和发现,他们的记忆碎片需要被重新打捞并缝合。

然而这种打捞与缝合对于处在历史彼岸的当下作家而言,是极难的。难的是创作主体要对历史碎片进行充分发掘、有效提炼与整体概括,超越线性的历史观,让不同阵营中的人物在战争的极端情境和冲突中经受肉体、生活方式、价值判断、思想精神的互见与试炼;难的是创作主体基于现代性的写作伦理传递出对历史更加全面的理解、更为深切的体认,进而表露出新的文学取向和气质;难的是在虚构叙事与历史真实的混沌关联中,建构具有存在感和思辨性的文学经验,最终以文学的方式超越历史的偏狭和局限。



《问苍茫大地》书影

《问苍茫大地》(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是石钟山最新创作的谍战题材作品,在这部悬念迭出、惊心动魄的精巧架构里,作者用雄浑而又沉稳的笔触,从渐行渐远的岁月深处打捞出一个色彩亮丽的故事,热情讴歌了人性之魅力在历史长河中灼灼闪烁的辉煌,悬念一波三折,形象栩栩如生,语言拿捏到位,在同类题材的作品中,显得尤为鲜活灵动。

我个人特别佩服石钟山的小说宣泄本能,他在作品里的游走路径可以做到非常自如,既有着浓郁的军人情怀,同时又可以将每一个作品的艺术维度非常恣意地延展到我们心心念念的每一个犄角旮旯。让我们在欣赏他的小说时,除了可以感怀故事本身所发散出来的张力,还能够品味、体察到人生意义的宽广与博大。我曾经提出一个军旅作品要更多地泛军旅化的文学概念,我特别感佩好些作者能够牢牢地站立于军旅题材的前沿,

描摹历史长河中的情感涟漪

——《问苍茫大地》拓宽军旅文学视野

周其伦

而将小说的触角和韵味灵动地扩展到人们日常的方方面面的努力,我觉得石钟山所取得的成效尤为显著。

石钟山的叙述特点相当独到,他时常可以在经意与不经意之间,把一个极其普通的小人物或者是一件人们见惯不惊的小事件描写得有声有色,而且整个叙述语言干净凝练,绝不拖泥带水。他作品里的故事桥段搭建往往给人以融会贯通的惬意,阅读起来常常让读者有一种情不自禁的急迫。他笔下的军人同样个性独特,情感大开大合,战争的残酷和军人的血性都演绎到极致,但他更能够从立足的军人天地去放眼大千世界的广阔与璀璨,在“人”的上下左右挪动中找寻到作品内在的丰厚潜质,充分而鲜明地表现了他小说的张弛有致。

《问苍茫大地》时间跨度漫长,从1948年写起,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的当下,惟妙惟肖地描绘了一个历经弥坚的反特故事,也细腻描摹了沉潜在岁月深处的情感涟漪。这是石钟山在努力地拓展泛军旅题材小说的视野后,又一次浴火重生的文学游走,读来滋味依然。

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局社会部情报科长毕剑,为了寻找代号为“老爷子”的国民党特务,耗尽了心血也未果;新中国成立后,毕剑等人转业到沈阳公安系统,“老爷子”也为了躲避追捕,化名成了生意人王守业,在毕剑等人与“老爷子”虚与委蛇中,日子悄然流逝,情节峰回路转。“老爷子”的“妻子”、谍报员赵静茹无意中发现了毕剑的妻子李巧莲,竟然是自己失散多年的亲姐姐,错

杂复杂的人际关联勾连起两代人的情感波澜。“老爷子”在看到儿子长大成人后自尽而亡,李巧莲、赵静茹两姐妹唏嘘相认,最终迎来了民族命运的重大转机,时代流变那呼啸飞奔的车轮从历史纵深处款款而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在毕剑和“老爷子”两人间的这场穷尽一生的“猫鼠游戏”中,作者没有过多地着墨于故事的离奇,而是紧紧地抓住人性深处的洞幽烛微大做文章,在小说的这些有情有义的叙述语境下,我们足以再度理性地去撩开尘封在岁月征程中的那一段火热,回望新中国从百废待兴的昨日到繁花似锦的今天这个过程万般艰辛,那种醍醐灌顶的意念与心领神会的感悟便会与日俱增。

作者很用心地把重心放到了人物命运的书写上,我觉得这应该是一次返璞归真的文学烛照。纵观文学长廊里每每能够被读者所记住的,一定不是玄妙的情节,更不是过于诡异的描写,只有站得起来、立得住脚的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才是成就作品感人丰满的不二法则。石钟山在小说中对正反两方面人物的拿捏,为人物的塑造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当然,《问苍茫大地》也描写了人生如戏的短暂、描写了曲终人散的不甘,但这些可亲可感元素的铺排都伴随着主人公那不屈不挠的人生信仰而熠熠生辉,唯有信仰在尘世中如此这般地超凡脱俗,它所彰显出来的诗意光芒才会如此这般地温暖宜人。

为何会误读古诗词

李能知

清代唐诗选本《唐诗三百首》的影响,蘅塘退士在选本里即作“返影入深林”。但是除了《唐诗三百首》之外,历代王维别集和唐诗总集均作“景”。这显然是蘅塘退士个人的臆改,失于考究。“返影”也曾运用于诗词之中,如宋代邓林诗《罔极堂》有“西日不返影,东流势如奔”,诗句的“影”似解释为踪影、身影更为恰当,又或者解释“影”同“景”。

回头看诗句,很明显此处取日光之意,否则何来后句的“复照”。若解释“影”同“景”,就是画蛇添足了。有的阐释者解释为树影照在青苔上,给人一种深林的幽深阴凉感,但是这与经典文本的原创性表达就大不相同了。原诗句的表达是与诗歌上联的听觉表达呼应,落日阳光照在青苔上形成奇异的色彩,给人以视觉上独特的体验,调动人的感官以体验自然之美。而若解释为树影,由于阴影的遮蔽,则不能达到色彩冲击的强烈效果,从而淡化了王维“诗中有画”的特色了。

在解决了“孤烟直”的问题后,整首诗的意脉也就流畅连贯了。“平安火”象征着边塞安定,敌人莫敢来犯。王维以监察御史身份出使边塞,从首联用苏武“单车”的典故,到中间二联雄壮阔大的景色描写,再到尾联“勘石燕然”的典故,整首诗的“盛唐气象”喷薄而出,诗人欲效先贤报效国家,无处不透露着积极昂扬的心态与大度的自豪感。而由于《红楼梦》中香菱对于诗句的美学阐释,使得有的阐释者将此诗与张九龄罢相一事相联系,认为此诗中“单车”“征蓬”“归雁”“孤烟”“落日”等意象所塑造的是“悲哀”“感伤”的意境,这种感情基调显然是与整首诗的气韵不合,与诗人所处的历史语境也是相违的。王维在此次出使边塞后所写的诗歌,如《出塞作》等诗篇皆刚健有力,气象雄浑,无半点感伤之意。

版本流变影响

经典文本在流传的历史过程中,难免会因为各种原因出现变化。有时候一个字的改动会影响文本的意蕴,有的改动是改得更好了,如著名的推敲典故;有的改动则是臆改或错改,使得文本的艺术表达出现偏差。而当这些臆改的版本成为了通行本,其贻害匪浅。所以,弄清文本在历史流传中的变动是正确阐释的基本前提。

王维名篇《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其中下联诗句实际上是借鉴了南北朝诗人刘孝绰《宴集贤堂应令诗》中的“反景入池林,余光映泉石”。二人诗句中的“景”字为其本意,即日光之意,“返景”即“落日的回光”(见陈铁民的《王维集校注》)。但有的诗歌注本注释“景”字时,将“景”通“影”,更有甚者将文本中的“景”替换为“影”。此改动是受如今最通行的

经典阐释者对经典再阐释时都无法回避其影响。

在经典文本的流传中,会出现一些影响巨大的著名阐释,每一位阐释者对经典再阐释时都无法回避其影响。例如,对王维《使至塞上》一诗最知名的阐释当属《红楼梦》第四十八回中的对话。此回中香菱说:“我看他《塞上》一首,那一联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合上书一看,倒像是见了这景的。”

香菱的阐释是结合了王维诗“诗中有画”的美学特色,

将王维诗句在脑海中用画的方式呈现出来,形成强烈的画

感。自此,当代阐释者大都按照香菱的阐释来解读此诗的美学特征,典型的如著名的《唐诗鉴赏辞典》。但是,香菱“想来烟如何直”一句看似有理,实则缺乏对用字合理性的思考。诗句中的“烟”并不是普通的烟,而是边塞烽火台所点的“狼烟”,狼烟的直是由于燃料的搭配而导致的,它的直不是无理,而是合理的。只有放一束“孤烟”是代表无战事的“平安火”。《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引《六典》载:“唐镇戍烽候所至,大率相去三十里。每日初夜,放烟一炬,谓之‘平安火’。”

在解决了“孤烟直”的问题后,整首诗的意脉也就流畅连贯了。“平安火”象征着边塞安定,敌人莫敢来犯。王维以监察御史身份出使边塞,从首联用苏武“单车”的典故,到中间二联雄壮阔大的景色描写,再到尾联“勘石燕然”的典故,整首诗的“盛唐气象”喷薄而出,诗人欲效先贤报效国家,无处不透露着积极昂扬的心态与大度的自豪感。而由于《红楼梦》中香菱对于诗句的美学阐释,使得有的阐释者将此诗与张九龄罢相一事相联系,认为此诗中“单车”“征蓬”“归雁”“孤烟”“落日”等意象所塑造的是“悲哀”“感伤”的意境,这种感情基调显然是与整首诗的气韵不合,与诗人所处的历史语境也是相违的。王维在此次出使边塞后所写的诗歌,如《出塞作》等诗篇皆刚健有力,气象雄浑,无半点感伤之意。

经典的阐释是永恒的话题,好的阐释是读者体会经典之美最便捷的渠道。经典作品往往具有多义性,这也正是经典的魅力。当代阐释学以其极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给文本的阐释带来无限的延展性。但过分强调阐释者的重

要性会导致阐释的随意、粗疏与偏离,造成作品的误读,从而使得读者难以认识到经典的精妙之处。学者张江认为:“正当之阐释,应以建构平等对话为目的,通过对话,实现交流,完成阐释。”所谓平等对话,即阐释者在发挥主观能动性、作出具有当下时代特色的阐释时,也应当对作品进行多维立体的考察,尊重文本背后的历史语境。经典的阐释是严肃且严谨的,这种严谨并不是在桎梏阐释者的权力,而是为了保护经典的经典性。笔者以中国古诗词为例总结了造成经典误读的三个成因。

著名阐释影响

经典的阐释者对经典再阐释时都无法回避其影响。例如,对王维《使至塞上》一诗最知名的阐释当属《红楼梦》第四十八回中的对话。此回中香菱说:“我看他《塞上》一首,那一联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合上书一看,倒像是见了这景的。”

香菱的阐释是结合了王维诗“诗中有画”的美学特色,将王维诗句在脑海中用画的方式呈现出来,形成强烈的画

感。自此,当代阐释者大都按照香菱的阐释来解读此诗的美学特征,典型的如著名的《唐诗鉴赏辞典》。但是,香菱“想来烟如何直”一句看似有理,实则缺乏对用字合理性的思考。诗句中的“烟”并不是普通的烟,而是边塞烽火台所点的“狼烟”,狼烟的直是由于燃料的搭配而导致的,它的直不是无理,而是合理的。只有放一束“孤烟”是代表无战事的“平安火”。《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引《六典》载:“唐镇戍烽候所至,大率相去三十里。每日初夜,放烟一炬,谓之‘平安火’。”

在解决了“孤烟直”的问题后,整首诗的意脉也就流畅连贯了。“平安火”象征着边塞安定,敌人莫敢来犯。王维以监察御史身份出使边塞,从首联用苏武“单车”的典故,到中间二联雄壮阔大的景色描写,再到尾联“勘石燕然”的典故,整首诗的“盛唐气象”喷薄而出,诗人欲效先贤报效国家,无处不透露着积极昂扬的心态与大度的自豪感。而由于《红楼梦》中香菱对于诗句的美学阐释,使得有的阐释者将此诗与张九龄罢相一事相联系,认为此诗中“单车”“征蓬”“归雁”“孤烟”“落日”等意象所塑造的是“悲哀”“感伤”的意境,这种感情基调显然是与整首诗的气韵不合,与诗人所处的历史语境也是相违的。王维在此次出使边塞后所写的诗歌,如《出塞作》等诗篇皆刚健有力,气象雄浑,无半点感伤之意。

经典的阐释是永恒的话题,好的阐释是读者体会经典之美最便捷的渠道。经典作品往往具有多义性,这也正是经典的魅力。当代阐释学以其极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给文本的阐释带来无限的延展性。但过分强调阐释者的重

要性会导致阐释的随意、粗疏与偏离,造成作品的误读,从而使得读者难以认识到经典的精妙之处。学者张江认为:“正当之阐释,应以建构平等对话为目的,通过对话,实现交流,完成阐释。”所谓平等对话,即阐释者在发挥主观能动性、作出具有当下时代特色的阐释时,也应当对作品进行多维立体的考察,尊重文本背后的历史语境。经典的阐释是严肃且严谨的,这种严谨并不是在桎梏阐释者的权力,而是为了保护经典的经典性。笔者以中国古诗词为例总结了造成经典误读的三个成因。

经典的阐释是结合了王维诗“诗中有画”的美学特色,将王维诗句在脑海中用画的方式呈现出来,形成强烈的画

我与孙犁从书出版

